

#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 中國崛起的意義

Interpreting the Rise of China

doi:10.6752/JCS.200903\_(8).0010

文化研究, (8), 2009

Router: A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8), 2009

作者/Author：石之瑜(Chih-Yu Shih);張登及(Simon T. C. Chang)

頁數/Page：193-212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2009/03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6752/JCS.200903\\_\(8\).0010](http://dx.doi.org/10.6752/JCS.200903_(8).0010)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 思想論壇

《文化研究》第八期（2009年春季）：193-212

### 中國崛起的意義\*

#### Interpreting the Rise of China

石之瑜

Chih-Yu Shih

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張登及

Simon T. C. Chang

中正大學戰略暨國際事務研究所助理教授

#### 一、詮釋中國崛起

「中國崛起」的印象無所不在。在社會科學語言中，有說中國崛起是中國威脅，有說是機會，也有說這是一種軟實力現象。在中國周邊，幾乎每個不同的社會中都有自居比中國更中國的逐鹿中原者，但也有鼓吹能吸納中國崛起現象的亞洲主義者，另外更有安於「邊陲」以依附中國者。來自崛起的中國社會當然有不少回應：有以和諧世界為因應，來抵銷中國威脅的印象；有以理當崛起自況，進而質疑為何外界不能接受強大中國的強硬態度。中國崛起的意義於是變化多端，並且顯然受到敘事者對中國的認識為何所制約。

不過，敘事者對「中國」的認識，也受制於自己與所面對的中國之間有何關係。比如說，歷史與中國有一千年以上交錯重疊的越南，對中國輸出佛教且最早被歐洲殖民的印度，或在帝國主義侵擾下一度追求脫亞入歐的日本，遑論親緣關係更接近的香港或台灣，不一而足。

---

\* 本文為會議發言稿，刻正進一步發展增刪中，歡迎讀者給予建議。

足。如此以觀察者與中國之間的關係出發，這些社會在群我的認同上會問，崛起的中國是否會與自己日益相互開放，進而構成爲一個更大的群體；在自我認同上會問，崛起後的中國是否繼續（或即將）與自己屬於同一種性質的民族國家、文明、地域或格局。可見，與中國的互動關係是一種對群我關係的認知，而群我認知的重要內容是關於群體歸屬與自我認同的兩種情感。

換言之，中國周邊的社會面對今日的中國崛起，就同時涉及面對自己的認識角度與情感。無論是應付中國威脅、期待中國改革、參與和諧秩序或彼此各行其是，都各自反射某種群我關係的情感傾向，因而透露了行動前已經預先在形成的動機，進而鼓勵刺激或壓抑逃避對中國崛起採取行動。凡是因爲崛起而產生的慾望，是熱情的情感；若是因爲崛起而必須因應外界對責任或角色的期盼，則是壓抑的情感，若是因爲崛起而帶來威脅則是焦慮的情感。

以上從認識中國的角度，到觀察者所屬社會與中國的關係，再到各自採取行動的傾向，中國崛起的文本已然引發後續無盡的開展。「中國」是否與「非中國」同爲屬性相同(sameness)的存在，以及中國是否與非中國構成一個群體，兩者交叉後，本文先得出四種觀察中國與非中國關係的視野——國家、亞洲、文明、天下，它們反映了兩種關於自我認同的情感，即機會感與威脅感。接著，本文繼續進入身爲觀察對象的中國在回應時從其中所採取的兩種視野——國家與天下。這兩種視野回應了近代中國以降兩種不同的文化需要——自我中心的需要與群體歸屬的需要。在兩種視野與兩種文化需要相互混合後，便產生了四種中國對非中國實踐身分的文本——國家利益、帝國主義、主權、中心與邊陲，各自反映了關於自我與歸屬的兩種情感，即熱情積極與焦慮迴避。最後，本文針對出自中國固有群體歸屬文化的一種實踐，即藉由中心與邊陲構成的天下追求和平崛起，並根據自我中心與群體歸屬兩種文化視野，得出四種中國對非中國和平崛起的戰略文本——軟實力、社會資本、無私無我、自立自強，其間反映的焦慮與熱情具體表現成來自中國身分的特殊情感，即攀附討好與振興改革。

簡言之，經由本文的歸納整理足以說明，「中國崛起」絕不是一個簡單的經驗實證現象。本文有關情感傾向的歸納，有助於說明中國崛起不可能純粹是實證的。「中國崛起」必須藉由詮釋，才能產生意義，而詮釋的方向又受制於對中國或非中國的情感。至於被觀察的「中國」，不僅是一個被觀察的對象，也同時是參與詮釋與回應外界詮釋的主體。

## 二、自我與「中國崛起」：情感的共享與傳染

一旦開始觀察中國崛起，心理需要的驅策力促使觀察者以自我與中國的關係為基礎。既屬人我關係，便有上述自我中心與群體歸屬兩個面向：一是從自我認同出發，問中國是否與非中國同類，或是異類；二是從群的歸屬出發，問中國是否獨立於非中國之外，或是屬於同群。認同的需要與歸屬的需要使得中國成為情感的來源與對象，故中國的崛起會引發熱情或焦慮，即機會感或威脅感。

我們因為個人成長經驗不同，而不能體會何以中國崛起會對於某人產生某種情感反應，而對其他人不會，或者為何某人特別對中國威脅感到敏感，因而容易產生焦慮，而為何其他人特別容易對中國機會產生敏感，而隨時衍生進取的積極態度。所以，只知道觀察者面對中國崛起時保持的是機會感與威脅感尚不充分，還需要進一步分析機會感與威脅感的來源及其強度，更重要的，則是特定情感傾向傳染給群體的機制。

情感會傳染，威脅感與機會感也可以傳染。傳染的途徑是透過從認知上進行角色指派來完成，亦即行為者根據自身對中國的情感傾向，對於在認知上不屬於中國範疇的其他行為者加以動員。如果認為中國崛起是威脅，便動員其他行為者作為自己的盟友，協助防衛，或協助排除威脅。被動員協防的其他行為者獲得善待與信任，對行為者產生好感，便接受行為者認知中的中國威脅。如果認為中國崛起是機會，行為者便與其他行為者競爭在中國的資源，其他行為者被視為是

競爭者，他們對自己在中國的機會也採取積極的作為，於是中國益加顯得是機會。行為者透過自己對中國或其他行為者的行為，將前者情感傾向，傳染給中國或其他行為者，引發中國或其他行為者對號入座的扮演某種角色，是為情感的共享與傳染。

中國崛起的印象在不同群體中引發不同反應，各個群體之內先透過大眾傳播機制相互傳染，群體之間則透過各種國際交流機制相互傳染。傳染的是情感，情感帶動對中國崛起現象的後續認知。換言之，行為者在動員其他行為者之前，會先動員其機會或威脅的情感，甚至排斥感，繼而供應關於機會或威脅的文本，才能完整完成動員。如果行為者之間的情感發生牴觸，則各自根據情感調動記憶庫中的具體認知圖像相互詰難，反而成為對彼此的威脅，因為這樣的相互詰難，關係到他們共屬的群體是何屬性，也就關係到個別行為者的存在意義。

### 三、歸納中國崛起的屬性

#### （一）屬性與情感

中國崛起的意義不可能任憑一個人的需要就決定之，因為觀看者的位置與所使用的視野，影響著他們對「中國」的情感和認知，從而決定觀看者對「中國崛起」的態度。觀看者的位置包括了他們所來自的歷史與思想脈絡、社會文化的背景與個人生涯成長的經歷，以及他們長期以來在理論與實踐上對中國產生的印象。而且，他們要在所能理解的知識範圍內找尋可用的參照點，無意識或有意地進行視野的選擇。不過，終極的動機是必須要回答關於自我中心與群體歸屬兩種內生的需要。

同時，觀看者與作為觀看對象的中國之間，往往存在千絲萬縷的互動，直接或間接混淆了主體與客體的界線。這對與中國歷史交錯重疊的周邊社會而言，尤其是如此。所以一旦觀看者將自己放在某個身分中，就幾乎同時決定了自己會隨之把「中國」放在什麼敘事脈絡中；相反地，一旦觀看者主張了要將「中國」放在什麼視野中，也幾

乎決定了自己進行觀察的位置。這樣的相互定位至少有兩個面向，一個是在理論上論述了中國的存在意義，說明中國如何崛起、崛起的程度、崛起以後的行為分析；另一個是反射了情感上遭遇中國崛起時的正負面傾向，主要表現成機會感與威脅感兩種。機會感因應了積極追求成功的慾望，威脅感則反射了迴避失敗的焦慮；亦即中國崛起的印象對某些人是誘惑，他們更願意參加這個過程；對某些其他人則構成威脅，因而設法圍堵化解。情感傾向浮現後，處理中國崛起的行為方向也隨之形成，進而引發具有中國身分的人所產生的回應，以至於中國崛起只能是主客相互介入後的印象。

在既有的觀看中國崛起的視野中，依照中國與非中國所屬群體屬性之異同與否，以及對中國是封閉性的或開放性身分的判斷不同，交叉後可以大別之為四類：

第一類是耳熟能詳的主流國際關係理論預設，即不論理論家如何在現實主義、自由主義或建構主義間往返辯論，都一概視中國與非中國為屬性相同但封閉的身分，亦即把「中國」看成是具有一貫、恆常不變的特質的概念或實體，這個概念或實體的邊界是清晰、僵固、封閉的，任何人難以隨意地聲稱具有其特徵，更不用說加入它。這樣的視野最流行於美國，但是包括中國在內的各地知識界與實務界，頗有沿用作為本身所屬社群的自我認識方法者。

第二類視中國與非中國為屬性相同但開放的身分，即「中國」的概念或實體不需是具有一貫、恆常不變的特質，而且此概念和身分是可以臨摹、穿透、參與和超越的。在中國大陸新近發生的「天下觀」屬之。但是在周邊各地包括越南、台灣、香港、韓國與日本都有天下觀的信仰者，他們在天下觀之下，取得與中國求同存異的另類身分。

第三類視中國與非中國為屬性不同且封閉的身分，即「中國」未必是具有一貫、恆常不變的特質、概念或實體，但這個概念的邊界是清晰固定的。例如近代印度知識界始終有這樣的觀點，可稱之為文明觀。在日本知識界也有以文明界定中國的論述脈絡，但與著名的文明威脅論大不相同。因為杭廷頓(Samuel Huntington)所謂的文明，必須

依附於現代主權國家方可行動。

第四類則視中國與非中國的國家屬性相異，但彼此身分互為開放，即「中國性」只是相對確定的，人們可以透過某種努力，取得乃至超越這一身分。這可以長期主導日本思想界的「亞洲主義」為代表。儘管亞洲主義流派分殊多元，且在韓國、台灣與中國大陸都有亞洲主義信徒，但他們共同採取的亞洲視野或東亞視野皆以「中國」為主要或重要內涵，並以此與歐美或西方相對，或謂亞洲與西方迥異，或謂亞洲比西方更具普遍性，從而中國的固有文化或地理疆界變成是可以加入、穿透和超越的。

上述四種面對中國崛起的情感及認知屬性，即是「中國崛起」的四種視野，可以下表來簡要示列。下節將進一步梳理它們的具體內涵。

表1：中國與非中國的四種關係與情感

	認同：「中國」與非中國的國家屬性同質	差異：「中國」與非中國的國家屬性異質
「中國」與非中國之身分彼此相互獨立	中國是民族國家 威脅感	中國是文明 無威脅且無機會
「中國」與非中國之身分可為同群	中國是天下 機會與威脅	中國是亞洲 機會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製表

## （二）四種視野分析

### 1. 國家

觀察中國崛起最常見的第一個視野，是將中國視為國際體系裡另一名典型的國家成員，受到國際體系權力均衡法則的制約。這種角度傾向認為，當國家實力相對不足的時候，應藉由加強軍備與參加結盟來制衡強權的侵犯。在國家實力相對強大的時候，透過裹脅與擴張來鞏固自己的優勢。根據國際政治學的體系理論(systemic theory)，國家成員之間的唯一差別，在於他們的權力大小，而國際體系的性質則是根據國家之間權力分布(distribution of power)的狀況來決定。因此，



某國與任何其他國家的屬性總是相同的，也不因為國家領導階層的信仰、種族或階級而出現差異。並且各個國家之間的權力關係是互斥的，一國相對實力的增長，就必然構成其他國家的潛在威脅。

在這樣的視野之下，中國崛起的唯一與立即意義，是國際間相對實力的分配出現變化，美國作為國際體系霸權的地位即受到挑戰，中國將擁有更強的能力裹脅或併吞周邊國家。至於即使中國國內因為推動改革開放而有市民社會的浮現，或領導階層的意識形態更進一步自由化，中國人民追求的市場利潤與美國人民日益趨同，甚至共產黨一黨統治的現象逐漸鬆動，都不足以掩飾中國成為美國在國際政治中的主要競爭對手的事實。其結果，就連中國本身都會意識到，自己的崛起正成為令其他國家感到的威脅，並面臨其他國家某種明示或默契的圍堵。反之，一旦發生被威脅的情感，國際體系就是最容易被援用來解釋中國崛起的理論。

## 2. 天下

第二個觀察中國崛起的視野是天下觀。天下是另一種迥異於主流國際體系理論的一種認識方式。在「天下」裡，國與國之間不存在不可消弭的疆界。各國的文化永遠是相互學習的，天下形同一種放諸四海皆準的範式，其主要關切在於維繫國與國之間的某種尊卑秩序。至於尊與卑的劃分標準不在於物質力量，而在於「德」。「德」乃是一種無私無我的道德氣質。但這樣的氣質透過物質實力豐沛的國家來展現，顯得最有說服力。畢竟愈繁榮穩定的強國在放棄以自己為中心，而致力維持各國之間和諧尊卑秩序時，愈能顯得以天下為己任，故德性又不是與實力全然無關。

可以認為，「天下」視角裡真正的實力，是無法純粹從「德」或「力」來衡量的，它要靠每個國家透過自己的努力自我提升，然後吸引其他國家前來學習。因此競爭不發生在國家之間的衝突過程中，而發生在對其他國家提供範式的吸引力上，因而必須由「以天下為己任」的國家自我砥礪。

這樣的天下觀之下，每個國家理當都可以透過自我提升臻於至



善，每個成為學習對象的國家，都是其他國家的啓示。當中國因為自身的振興而達成某種足為範式的境界，再透過無私無我的展示吸引各國的推崇和臨摹，則中國的崛起就會成為其他國家自我砥礪的範本——即經典中「有為者亦若是」、「人皆可為堯舜」的理念。但也因此導致其他國家同時要面對可以依附學習的機會，與必須淪為邊陲的焦慮，故中國崛起之際，天下之尊卑發生變化，機會與威脅同在其中。理論上，天下觀讓每個國家都在不斷相互觀摩學習中演進，以現實主義的「力」相較量的威脅不是國與國互動的主題，因為國家的屬性與角色各有不同，但是他們的尊卑地位，則因中國崛起而可能受到貶抑的威脅。所以，威脅感的發生也可能帶動天下觀的形成，端視觀察者的文化脈絡。

### 3. 文明

第三個觀察中國崛起的視野是文明政治。這時的中國自然與眾不同，其文化與制度因其長遠以來歷史實踐而形成深厚的脈絡，不但賦予大多數具有中國身分的人某種相互認同的歸屬感，更透過社會化的價值教育，同化各種因為文明間交流而輸入的外來文明特質。文明的內聚力量一方面象徵著不能與其他文明混淆的某種特殊性，因而既不會因為累積了更多的物質力量就自動消滅其他的文明，也不會因為流失物質力量就轉化為其他文明的附屬；另一方面文明的傳播力量則由於出自不同的文化預設與價值前提，往往只能從旁促成其他文明進化，而不能徹底同化之。

這樣的中國一旦崛起，立即產生的效果是替固有文化的表現型態帶來多樣化，讓自認屬於中國文明範圍的成員感到自信與自豪，故而對外來文明的輸入與採納有更大的寬容度。文明之間的競爭主要是在於器物方面，不在精神方面。以保護固有文化之名行動的政權或人物，不論其潰散或成功，完全不能反映文明之間的消長。簡言之，與杭廷頓的文明觀最大的分野在於，文明的核心不是物質力量。因此，當以文明之名擴張的政權或團體看似取得勝利時，這些勝利是政權的勝利，不屬於文明的勝利，因而是短暫的。對於採取這種文明視角的當事人而言，在歷史長河中，這樣的勝利似乎改變不了文明之間的不

可滲透性。故在文明視野之下，中國作為一個文明的崛起，既不構成對他人任何有效的威脅，也不能提供他人深入參與的機會。

#### 4. 亞洲

第四個觀察中國崛起的視野是亞洲主義，這與前述從國際體系的角度看中國迥然不同。在國際體系理論之下的中國除了是與其他國家同質的，更重要的是彼此之間的互斥性，所以中國的權力增加傷害到其他國家的安全感。但在亞洲主義視角之下，中國不再被視為是民族國家，而被視為是可以分化重組的多重社會過程。這個社會過程可以是民族的，因此中國被視為是多民族的綜合體，而且因為與各個亞洲民族甚或亞洲以外民族不斷互動，形成不斷跨越中國主權疆界的社會過程。中國又可在各個經濟地理資源的分布中，被消解或重組成非關主權與國界的區塊。中國更是在全球化流通中被不斷進出的臨時身分(contingent identity)。與中國共屬於亞洲相對應的，是與歐洲或西方的明白區隔，讓中國與非中國之間成為具有各自不相轉換的存在屬性。一方面中國與亞洲之間的差異模糊化，亞洲成為互動的場域，或進行不斷更新的過程，另一方面，中國與非中國之間的差異成為不能跨越的界線，中國與亞洲是相互構成的，其結果，亞洲與非亞洲之間的差異具有了本質性。

在這一視野下，中國不再是主張身分的有效基礎，而與所有其他亞洲民族身分一樣，變成為某個因為不斷混雜、重編而失去本質的實踐過程。當以中國之名的主張獲得大量資源挹注而形成崛起之勢時，亞洲便同時得到更多的刺激而加速流通，厥為與歐洲或西方進行抗衡，超越歐洲或西方的大好機會。準此，具有中國身分的民族國家意識融入亞洲，造成與非亞洲的對抗，此時「中國」又變成對歐洲或西方的威脅。

### 四、反思中國崛起的實踐

#### （一）實踐與情感

在上述反映了自我與群體需要的四種對中國崛起的觀看視野中，

受到當代中國知識界採納進而實踐的，主要是國家與天下兩種視野。在採取這兩種視野的同時，也產生相應的情感。但不同於其他群體觀看中國時的機會感或威脅感，而是擁有中國身分的論述者的自我期許。

自我期許的情感已如上述可以大別為兩類：一為生命生成時以自我為中心的權力地位的維護，這樣的維護構成能動者持久的趨力，屬於一種內生的宰制世界的欲求；二是社會化過程中以群體生存發展為主要考量的責任的履行，是一種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物種需要，其功能在於整體秩序的維護，經由參與了外鑠的文化而養成。如前所述，兩者的比較類同於精神分析中本我與超我的分野。本我的存在是生命的需要，在本我的自戀傾向向下所實踐的人我關係中，世界是為我存在的，供我汲取，不受規範的節制。象徵超我的則是抑制慾望的道德倫理價值，有賴社會化的學習養成，其間受到的社會制約，讓角色的扮演必須受到社會的評價，從而成為爾後焦慮的來源，外界透過對超我角色的認可程度，決定自我實踐的意義。在本我的情感中，不論是國家主義或天下主義的崛起，都是為了滿足自我中心的需要。然而在超我的情感中，則兩種觀看視野都一樣成為必須學習的角色。然而，文獻中關於國家主義成為小我的角色，與關於天下主義成為自私的需要，都少見探討。

一般而言，國家主義的視野是自我中心的，不需要顧忌其他國家的需要。如果有顧忌，主要也是為了自己國家的好處，因此是在伸張權力意志，中國的崛起意味著欲求更多的目標。而天下主義的視野則是以群體中的小我自居的。國家各有其角色，因此而參與社會化的學習過程，不容放縱自為，中國的崛起便成為其更多的責任。

然而，在實踐的過程中，社會化不完全而失敗的歷史經驗歷歷在目，居於天下中心的天子橫征暴斂，貪婪無度；居於邊陲的特寵而驕，桀驁難馴；中心與邊陲訴諸暴力皆無顧忌，上下交征，儼然帝國興衰的爭奪，同時反映了本我擴張晉升的慾望與超我不被認可的焦慮。另一方面，看似自我中心的國家主義在輸入中國文化地區的過程中，成為一種由外而內強加的國家範式。由於固有文化對這樣的主權

國家身分毫不熟悉，加上轉換過程中一再受到不平等條約與劃分勢力範圍的侵犯，國家主權充其量只能成爲一種可望不可及的理想目標。爲了讓國際體系接受，刻意的以主流國家爲模範，臨摹主權，於是中國的主權具有一種角色扮演的性質，而不是歐美主權那樣自我中心的縱容。如此終於等到有一天取得平等的主權身分之後，即不再擔心國家遭到入侵後，化解了不受承認的焦慮，但原本又不存在爲國家不斷累積權力的需要，所以這時主權便失去能動性，不能提供國家行爲的動機。

表2：中國對非中國的身分實踐與情感

文化需要 認識論	自我中心	群體歸屬
民族國家	行爲：維護國家利益 情感：熱情	行爲：維護主權身分 情感：無熱情且無焦慮
天下	行爲：維護帝國主義 情感：熱情與焦慮	行爲：維護中心與邊陲關係 情感：焦慮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製表

（二）四種既存的實踐

1. 國家權力滿足自我中心

從清末以來，中國的國家領導人在戰敗中學習喪權辱國的意義。九一八事件曾促使中國政府以主權之名向國際聯盟求援。1945年時，中國成爲聯合國的常任理事國。1949年以後，內戰未歇的兩黨爲了在國際上爭取代表中國主權進行殊死戰。到了1980年，進入美國政治學界的華人學者從論述上將國家中心主義的思維帶回祖國，以致國家中心主義以外的敘事近乎絕跡，甚至被貶抑爲封建思想。一旦身處在帝國主義侵華百年的歷史記憶中，與冷戰以降帝國主義謀我日亟的圍城氛圍中，國家中心主義下的國際政治理論提供了以國家利益與權力競逐爲內涵的政策理由。於是師夷長計以治夷成爲主流，猶如擺脫所有禁忌，國家利益成爲所有對外政策的理由，一切以權力平衡爲考量，無可無不可。如何在國際上爭取盟邦，抗拒敵對陣營，不受節制。在

無政府的國際體系理論下，爾虞我詐，縱橫披靡，成為相當一部分中國知識界與實務界中人所渴望的境界——或曰「時務派」，或曰「時勢派」。

表面上，國家中心主義的最高理想是擺脫道德與感情。然而所可滿足的，正是最深層的自戀的需要。中國崛起的印象之所以令人悸動，恰恰是因為它提供了睥睨世界、推翻霸權、懲罰叛逆、報復美帝的想像。任何蛛絲馬跡皆可以被當成是營建國力的契機，權力成為最高的目標與最大的誘惑，是超越所有禁忌的工具。

## 2. 帝國主義滿足自我中心

在清末以前，這種不受節制的想像有古典理論作為基礎，此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從而容許天子無所不在的介入。藉由無所不在的想像，朝廷在實踐上是天高皇帝遠，王官不問，草民不聞。這樣以假像為內容的天下觀，經不起些微的挑戰，以免因為天子被侮蔑不再受到尊重，揭穿了天朝並非蠻陌之邦行矣，導致天下大亂。

正由於對這種些微的挑戰難以處理，以至於天下體制充滿了焦慮，愈近天朝，禮儀愈細膩繁瑣。21世紀重現的天下觀立刻引發國外中國研究者焦慮，正是他們在字裡行間讀到宰制的慾望，似乎延續了某種對四夷邊陲的漠視。此何以倘若天朝擁有懲罰的實力，必不吝惜使用。透過征服，天朝享受自己的德威，在擒縱之間，表演德被天下的自我期許。要言之，在天下體制的維繫中，其實交織著征服的慾望與禮儀的焦慮。

新近流行對中國崛起描述為脆弱的超強，果然掌握到其間蘊藏了矛盾的情感。中國知識界回到天下觀的主張雖具備固有文化的基礎，但是對於藉機挑戰天下觀的邊陲力量，不論是邊區民族的身分政治或異議人士的黨政維權，不能不仰賴政權展現征服的實力，尤其是要有排除異邦惡意介入的決心，以振興帝國的尊嚴。這樣的尊嚴延續了帝國無遠弗屆的想像，中國的崛起接受無遠弗屆的推崇與膜拜，構成難以抗拒的誘惑。

### 3. 主權身分滿足群體歸屬

雖然國家中心主義可以創造令人悸動的無邊權力想像，但是現代的「國家」並非中國固有文化的理念，加入國際政治更必須在歐美所謂先進國家的虎視眈眈下接受檢視。1971年以後北京進入聯合國，戰戰兢兢，宛如在扮演一個學生的角色，並沒有享受到主權身分所隱含的不受節制。相反地，主權成爲一種角色，猶如取代了王道成爲天下的新範式，成爲位居邊陲學習成爲國家的中國，所努力臨摹嘗試的任務。

西方主權制度本身認可了國家政府作爲自身的最高統治機構，但同時要求尊重其他國家的主權。以至於主權的無邊暴力只能在邊境之內行使，雖然沒有其他國家能輕易干涉，或即使干涉也不容易得逞，所以不必太在乎。同時主權並不能成爲擴張征服的正當理由。尤其主權制度讓中國固有文化成爲毫不相干的瑣碎紀錄，甚至淪爲除惡未盡的封建餘毒證據，很難讓履行主權國家角色的外交代表產生熱情。同理，捍衛主權不受侵犯不再需要長篇大論或動員民族主義，因爲主權本來照定義就是屬於自己的，苟遇有挑戰，重申主權足以駁斥。只有在列國進行對特定事件採取經濟圍堵或懲罰時，才會引發氣憤或不平之鳴。但主權體制本身不像國家中心主義那樣是以慾望爲其內在構成的。把主權身分認真執行的唯一動機，是要剝奪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爲所欲爲，而不是因爲主權保障了宗教靈魂，長此以降，終於遭致老牌中國通的諷刺，直指中國爲冒充成主權國家的文明。俟中國一崛起，主權身分便不足以創造激情。

### 4. 中心與邊陲滿足群體歸屬

辛丑和約之後，中國知識界承認中國是落後國家。他們或許致力於建立中國的主權國家形象，但是更重要的，是抱持著學習的心態，臨摩西方主權國家的範式，包括宣傳公民教育，建立財政機制，甚至借搬憲政主義，試探選舉制度。但到今天爲止，沒有任何類似西方的政治文化能在華人世界建立。即使香港與台灣等受到英國或日本殖民影響的地區也不例外，從西方自由主義標準看來均難稱同類。不過，



他們之間經常比賽誰更接近西方，所以台灣論者以自己有普選而自豪，香港則為國際金融中心而傲視內地。相對於此，2008年的北京奧運，猶如是中國進入大國的一次測驗，看看中國能不能成為列強欣賞的現代文化，或在西方發展的體育活動中擊敗西方體育大國。換言之，中國自居天下觀的邊陲，競相努力，或真或假爭取西方國家的認可，以躋身先進國家之林。在比賽中不斷被西方檢視的感覺，使得中國崛起的過程充滿焦慮，也不斷遭到西方國家以中國威脅理解後試圖阻撓。愈阻撓就愈增加被凝視的壓力，也就愈增加臨摹的挫折與自我宣傳的傾向。同時，焦慮中崛起的感覺，讓人對邊陲地區的歸心極度敏感，成為西方得以借用西藏或台灣挑釁北京的基礎，因而有時加深了自居中原者的懲罰慾望，如在西藏；或有時故意視而不見難以羈縻的尷尬，如在台灣。

## 五、選擇中國崛起的路徑

### （一）戰略與情感

當代中國國際戰略思維中，天下主義的論述後發先至，異軍突起，以「和諧世界」的提法重新躍上世界舞台。不過這樣的提法除了可以通過中國固有文化的詮釋產生意義之外，又因為進入了西方知識界所不熟悉的領域，不得不借助社會科學的語言加以翻譯其意義，也就延伸出在固有文化詮釋中所沒有的意義，進而制約了提出和諧世界論述的初衷。

在和諧世界論述所影射的天下主義下，中心與邊陲兩種角色均要求抑制自我中心的國家主義。若是已然自感崛起的中國，在自信之下，可以更大程度地容忍挑釁，若是自覺崛起未完成的中國，則會致力於振興改革，繼續向西方取經。不過，為了向西方說明和諧世界的觀念，避免中國威脅所導致的圍堵，便又試圖借用西方社會科學敘事來解釋什麼是和諧世界。比如借用軟實力來說明中國文化魅力的上升，一旦軟實力獲得提升，就進而表示軍事已經不再是自居中心的中



國思考國家利益時的主要內涵。或自居邊陲時用中國還是開發中國家的弱者姿態，爭取國際上的同情，廣結善緣。又比如採用社會資本的觀念，說明看似與資本主義精神不符合的社會關係與人情，使得人情可以理解為是一種投資，所以關係主義在本質上與資本主義不但不抵觸，反而還是相輔相成。不論是軟實力，或是社會資本，都將原本群體導向的和諧世界觀念，轉譯成了是個人主義的利害觀念。

不過，鼓吹軟實力與社會資本的概念，正好顛覆了和諧世界的願望。在和諧世界之下，中國是忍讓的，社會的，角色的，內斂的，但是，一旦這些氣質或價值都理解成為是一種權力資源，就鞏固強化了國家主義的邏輯，則中國為維持和諧世界所做出的努力，就都變成是自私的。且以中國自身權力考量為依歸的，所以又是帶有威脅性的。和諧世界觀與這個掉入既有國家主義論述的涵義相反，亦即仍然維持了關係主義的行為，但是國家主義或個人主義為視野的利害考量，無止盡地介入和諧世界的意義。

又例如軟實力是文化魅力，所以有賴於消費中國文化的全球消費者參與其中，這時如何裝扮中華文化就不是從固有文化出發，而是從西方的消費偏好出發，這樣的文化魅力不是中華文化的魅力，而是西方消費主義訂購的魅力。同樣的，社會資本的觀念把小我的群體主義翻譯成了唯我的個人主義，把深化改革的意志，變成了跟資本主義世界拉關係走後門。甚至倘若由華人作者以社會資本的觀念進行文化翻譯，別具信用，則關係從一個原本是內生於個人生命意義的概念，淪為是一個充滿機會主義的概念。中文文獻中流行軟實力與社會資本論述的現象，恰恰說明來自歐美的社會科學才是真正的軟實力之所在，導致社會關係主義或和諧世界等反映固有文化的情感，從本體論上就遭到否定，讓和諧世界滲入了原本並不存在的競爭意識。

表3：中國對非中國的戰略選擇與情感

群己關係 反思定位	自我導向（個人主義）	群體導向（集體主義）
中國在中心	經營軟實力 形象攻勢、討好	展現無私無我 和諧（不討好且不振興）
中國在邊陲	累積社會資本 攀附（討好與振興）	展現自立自強 振興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製表

## （二）四種既存的路徑

### 1. 經營軟實力

上述的群己關係取向與反思角度定位，構成了四種實踐路徑，可再分述如下。1997年之後，中國的崛起逐漸成為中文傳播中普遍接受的印象。當年鄧小平過世之後，適逢中共召開號稱第三次思想解放的第15屆全國黨代表大會，象徵第三代領導人接班。是年香港回歸，喧騰世界。官方文獻首度提出專門針對大國的外交指導。俟後遭遇亞洲金融風暴，人民幣成為強勢貨幣，支援香港擊退國際投資客的大舉入侵，中國又成為經濟大國，並展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談判。於四年後加入時，儼然已不堅持原來自我界定的開發中國家身分。2003年「和平崛起」理論一度成為中國的世界定位。

短短六年之間，中國這個身分所賦予政治領導人的國家信心一飛沖天，中國的太空船與太空人果然一再突破瓶頸登空。而由中國製造的若干不良商品順勢行銷全球，也造成中國形象的折損。2008年北京奧運是象徵中國在形象攻勢中的最高潮，舉國在共同招待全球來客的籌備中，動員史無前例的龐大人數參與，投入不可計數的資源，一改過往籌辦奧運城市著眼商機的資本主義考量，而以做好世界東道主自許。就在籌辦奧運的數年間，孔子學院在世界各地設立，繼日本、韓國與台灣之後，以更大筆資金鼓勵世界各地中文學習，推薦中華文化，寄望提升世界對中華文化與中國文物的喜好，宣傳並實踐與鞏固和平

發展的時代精神。如此崛起，提供中國在全球政治中運作的軟實力。

## 2. 累積社會資本

由於大陸貧困人口依然龐大，環境資源不斷流失，三農問題缺乏立竿見影的政策因應，加上社會主義意識形態難以號召人心，社會道德崩壞，基層組織鬆動，領導階層日益濫權腐化，因此黨中央時而表現出對於中國崛起這種印象的忐忑不安。如何掌握更好的國際環境，抓住20年未有的發展機遇，成為無所不在的宣傳標語。

準此，中國領導人仍然自認未能進入先進國家之林。如何維護和平的國際環境，避免捲入世界性或中國周邊的區域性爭端，端賴良好的國際關係。在這個自我認識之下，睦鄰外交是中國外交界在21世紀的重責大任。而中東戰爭與反恐戰爭則是避之唯恐不及的燙手山芋，北京應該採取韜光養晦的態度，控制反日的民族主義示威，緩和與美國在轟炸南聯盟大使館與EP-3偵察機撞擊事件中衝突的升高，面對藏獨與台獨的躁進，不受激將，力求息事寧人。

再者，在中國固有文化裡，奧運期間作為東道主接待外賓本是天經地義的責任。但如果是想借用機會建立社會人情關係，以便未來獲取在物質上的更大好處，則社會交往無非只能理解成是一種投資。既是投資，則其程度端視所預期的報酬而定，一方面營造世界對中國的基本好感，另一方面集中個別對象如美國、朝鮮、日本以建立人情關係，替改革爭取時間，因此基本上是有所圖謀的、自我中心的，只顧及中國自身的國家利益。其內容主要是追趕先進國家的發展水平，因而並非以國際關係或鄰邦盟友的共同利益為依歸。

## 3. 無私無我

中國崛起之後，儼然成為世界注目的中心，也成為爾後力爭上游的其它國家所模仿或挑戰的對象。此刻亟須展現某種無為而治，不與人爭的文化氣質，讓中國成為吸納與開放的領域，乃是維繫所有國家在內的天下體制的主要條件。這時，許多原本帶來困擾的現象，都成為可以容忍的插曲而已；原本需要追著對方要求修正或澄清的事件，也都成為可以等待將來對方自己逐漸理解後再進行調整的一時誤會。

易言之，對於在中國固有文化下思維的實踐者而言，整體的和諧是天下得以持續的前提。個別事件的衝突會帶來對既有尊卑關係的破壞與挑戰，便不應該斤斤計較。這樣和諧的尊卑關係比中國基於國家本位所考量的物質利害更為根本，離開和諧關係以後的中國等於失去繼續存在的情境。因此為了和諧而做出的忍讓，或為了強化和諧而對外推動的文化輸出，無一是在為中國增加自己的作為「國家」的利益，而都是在示範一種不以國家中心為本質的國際關係。

在這樣的實踐路徑下，中國將自己的崛起放在一種群體關係中，將體系中存在於國家間的競爭，由自己片面承受，使得衝突的對象消解於無形，國家間利益的衝突轉化為不分彼此。不可諱言，如此天下體制的維持有賴於中國龐大的實力與資源。只有已經崛起的中國，在實力受到列國認可，自信心已在國人之間重建，才可能讓天下體制獲得落實的機會。

#### 4. 自立自強

居於和諧世界的邊陲力爭上游時，中國的崛起有賴於向居於中心的文明範式學習。比如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根據其規則改造國內的生產過程，正是一種自我改造。自我改造所要達到的標準，不是從固有文化中得到的，也不是從社會主義的建構理想中得到的，而是從資本主義的生產效率中得到的。其中雖然保留了許多社會主義或固有文化的特色，但是總的方向是朝向增加宏觀的生產力與微觀的生產效益方向。由於每個歷史階段所要仿效的文明範式重點不同，加上模仿對象的內涵也不斷開展，邊陲意識往往造成受制於人的困境。

例如清末民初的各種自強運動是以器物為主，當時追求軍事現代化，直到1980年代猶努力於國防現代化。不過經濟現代化的重要性急起直追，資本主義補課論甚囂塵上，後來連私有財產權、土地移轉權、智慧財產權都紛紛引入成為制度。但是，作為中國臨摹對象的中心的範式在1980年以後改變了，人權開始成為重要的內涵，但當時的主要對象不是中國。不過到了1990年代，人權成為對中國的主要政治要求，終於人權成為中國國家論述的一部分。但21世紀伊始，具體

針對中國的西藏與台灣問題又提出來，他們無法成為範式，因為他們是中國獨有的和戰問題。這時從中心國家所提出的全球化與和平價值便極端重要，讓中國威脅的討論放上議程，於是軟實力與文化魅力現在是中國最新一波的自強運動內容，但毋寧說是臨摹軟實力的學習姿態，而不見得真的是軟實力。

## 六、結論

本文的分析指出，如何面對「中國崛起」實際上涉及對「中國」的情感，這樣的情感反映了自我中心與群體歸屬兩種文化需要。看到中國崛起油然而生的威脅感，其產生乃是來自於中國崛起以前的中國認識角度。這是為什麼「中國」及其「崛起」不能只是實證度量的問題，也就不能只是科學問題，而必須同時是一個詮釋的問題。

例如在崛起以前就存在於中國的天下觀，同樣影響被觀察的中國如何面對自身的所謂崛起。崛起過程中，當事者可能感覺自己即將成為平等的主權國家，或甚至晉升為世界大國。但機遇當前，反而沒有充分的意志去主張唯我中心的國家利益，卻會強調「韜光養晦」的重要性。因為，自我砥礪並追求被接受與被認可，是固有文化下，自邊陲向中心逐鹿的理想。在這樣的理想之下，透過累積更大權力所贏得的崛起形象，卻反而帶來更大的焦慮，因而在情感上是與充滿權力渴望的國家中心主義大不相同。前者對權力慾望是壓抑的，後者是放縱的。

因此，當天下觀提出時，觀察者可能想到的是帝國主義，而當事人則一心想成為一種範式而刻意討好。當軟實力的概念輸入中國知識界，也強化了討好外界的傾向。其中主導著消費中國形象的全球化管理者，便得以介入對中國崛起意義的詮釋。至於中國的權力到底已經累積到多大的實證問題，不再是中國崛起討論中主要的內容。而另一方面，因為討好成功，受到更大歡迎後所帶來的影響力，也不受到權力增長可能實際很有限的限制。

總結而言，本文從心理學與精神分析出發，探討了看待「中國」

與其「崛起」的觀察位置所滿足的心理需要與其間的情感取向。這些位置與取向構成了四種對待中國崛起的視野：國家主義、亞洲主義、文明與天下。中國或其周邊社會都可能採取這些視野來理解中國崛起。忽略這些視野上的差異，便無法理解何以某些當事者把中國崛起視為機會，其他人又把它看作威脅。而如果位置是從中國出發，則情感與實踐的取向也可對應區分為四個類型：國家權力、帝國主義、主權身分和「中心－邊陲」取向。這樣的分析同時表明，「中國研究」不僅是一個需要適應國情調整研究工具的研究方法或方法論問題；它實際上涉及到「知識」形成的前提，亦即中國與非中國關係涉及群我關係，而群我關係帶動情感，並仰賴文化具象之。也唯有對此深入反省，才可能理解不同當事者面對中國崛起的態度差異。